

# 政治学

／  
亚里士多德 著  
郭仲德 译

政治学经典译丛



Politics  
Aristotle

非外借

西北大学出版社

# 政治学

---

Politics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著 郭仲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郭仲德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604-3741-5

I. ①政… II. ①亚… ②郭… III. ①政治学—古希腊 IV. ①D0 ②B502. 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0122 号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郭仲德 译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 -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741-5

定 价: 45.00 元

谨以本书献给生我育我的父母亲！

—郭仲德

## 亚里士多德生平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希腊东北部斯塔吉拉（马其顿属地），其父是马其顿国君科图斯的御医。17岁时，亚里士多德负笈雅典，就读于柏拉图学园，成为柏氏得意门生。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相传这是因为柏拉图属意其侄接掌学园，亚氏失望之余，偕同柏氏另一高足芝诺格拉底一起到小亚细亚阿索斯。该邦僭主赫尔米亚斯也是柏拉图主义者，在他的赞助之下，亚氏等人在该地建立了柏氏学园分校。这位僭主与亚氏私交甚笃，不久将养女庇西阿丝许配给亚氏为妻。

公元前343年，亚氏应马其顿国君腓力浦之请，赴首都贝拉给13岁的王储亚历山大当教师。腓力浦王长年在外征战，亚历山大于16岁开始为父王摄政。

公元前336年，腓力浦王遇刺身亡，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翌年率大军远征。亚氏好友安提帕特出任马其顿摄政王，希腊沦为马其顿保护国。亚氏回故乡短居，于公元前335年再赴雅典，在吕克昂建立亚氏学园，此时柏氏学园已由芝诺格拉底出掌。亚氏49岁时原配去世，婢女海尔庇利丝为继室。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猝崩，雅典议会向马其顿宣战并驱逐马其顿驻军。两国兵戎相见，亚氏因与安提帕特的私谊而受到牵连。雅典祭司因亚氏曾祭颂赫尔米亚斯亡灵控以亵渎神祇罪。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荼毒青年”和不拜祭雅典人神祇等莫须有罪名被处死。亚氏扬言不容雅典人“对哲学二度犯罪”，

## 政治学

决定离境,结束 14 年的教学生涯,回到优卑亚岛哈尔基斯母亲故居。公元前 322 年病逝,享年 63 岁。雅典的亚氏学园弦歌不辍,直到公元前 86 年,为罗马大将苏尔拉摧毁。

## 导 言

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哲学的萌芽期。泰利士是最早的哲学家,提出水是万物起源的学说,并且曾因准确预测月食而名噪一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派,提出灵魂不灭论。芝诺区分现象世界与实在世界,提出运动既静止又不静止,并且首创逻辑归谬法。赫拉克利特首度提出存在的终极原则即是知识的终极原则,探讨了事物的知识与事物本身的关系。

尽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希腊文明早2000年,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比雅典的梭伦法制早了1500年,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以降的2000多年,希腊思想家发挥了无穷的原创力,运用抽象思维,进行实际观察,归纳演绎创立了数学、哲学、科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学科。希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迄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拟。

这段时期也就是我国春秋后期至战国后期,斯时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开放,学术文化鼎盛;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东西方同步,取得了照耀千载的成就,也塑造了各自的文化特质。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代对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的影响深邃久远。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个人著作,他的哲学思想见于柏拉图所撰的20多个对话录。柏拉图有时也假借苏氏之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苏格拉底和前期的柏拉图历来被视为一体。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里德称一部西方哲学史实为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脚注,此语并非溢美之词。

亚里士多德17岁开始受业于柏拉图,其时柏拉图已60岁。亚氏追随业师20年,一直到他去世。亚里士多德于中年时期建立亚氏体系:在本体论方面,扬弃了柏氏的理型论,主张实在论;在知识

论方面,摒弃了业师的唯理论,提倡经验论,即使在政治学方面,也抛弃了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从实际出发,追求次好的优良政体。

亚里士多德从小受当御医的父亲的影响,吸收了不少生物和医学知识,长大后十分重视观察,并且相信经验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柏拉图却排斥感觉世界,认为必须通过数理来认识真实世界。这两位罕见的天才,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哲学倾向,尔后 2 000 年在西方主流哲学中,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平分秋色。

亚氏是古代学识最渊博的思想家,他曾潜心研究生物学。他发现自然不但发生变化,而且有趋向性。例如,橡实即使有石头压着,仍会破土而出,长成一棵完全的橡树。动物幼体会努力地逐渐长大为成年动物。长成之后,这种努力就停止。所有有机体都有天生的目的。亚氏把目的论自然观应用于人、家庭和城邦(国家)。

人的目的就是充分发展本性,实现潜能,达成完美;而人必须是城邦的一部分,才能达致人的终极目的。亚氏有句名言是“人是政治动物”,因为自然赋予人言语能力,彼此能交流沟通“公平”“公正”等道德观念。人的自然本性能适应城邦生活,家庭和城邦就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城邦的最终目的也是幸福(至善),只是后者更加高尚和完全。

亚氏的政治学是建立在伦理学之上的,德性论是元理论。他认为个人或城邦的幸福是一种合乎德性的活动。这与古希腊提倡为政以德的思想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反对智者派普罗泰卡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之所好谓之“善”,所嫌谓之“恶”的观点,他们主张善恶有客观的标准,美德具有内在价值。亚氏师承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认为德性是通过灵魂理性部分的活动得到实现的。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把亚氏的政治理论纳入罗马天主教教义,但强调单靠人的理性达不到至



善,最终要靠神恩。

在 14 世纪中期至 16 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哲学的德性论受到《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的严峻挑战。马氏不否定亚里士多德揭示的道德价值,但批评德性的生活必然愉悦和幸福是一厢情愿。他指出统治者为政以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当政者为排除政治障碍,运用权谋是理所当然的。经典政治学的要害在于德性论,因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17 世纪英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尖锐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优良政体纯属子虚乌有,德性论和目的论是形而上学。柏拉图和亚氏提倡的是乌托邦政治学,立足于人“应当如何”,不是人“实际如何”。人是自私的动物,决定人的行为既非德性,亦非理性,而是激情和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保全意识。道德不是客观、绝对的规范或义务,而是基于自我保全的欲望的权利。霍布斯批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都是人的德性生活,所谓道之以德,陈义过高。霍氏指出在他之前的所有政治学理论都不是建立在人的自我保全这个具有科学客观性的事实之上,完全脱离了实际,所以毫无意义。

霍布斯强调的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在政治理论方面标志了从永恒秩序转向人,从规范转向权利的新思维。自我保全的欲望取代了天生权利的目的论,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至善的学说从此式微。自霍布斯以降,西方政治学家鼓吹的人的自然权利已不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公正”本身,而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和自由。

西方近代政治学对道德观念几乎不赋予内在价值,视之为基于人的自我保全意识所发展出来的符合个人最大利益,因而乐于遵守的共同规范。作为国家理论核心思想的社会契约论于是成为显学。

西方经典政治学的奠基者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氏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氏的《政治学》是最著名的经典作品。《政治学》第三卷第16章提到“完善的人是动物中最好的。但是,如果人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却是动物中最坏的”。因此亚氏的结论是:“法治比人治较为可取。”他坚信君王制优于僭主制,原因是君王必须遵守法律。这种“法律至上”“政府须受法律制约”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3世纪英国《大宪章》至1789年美国人权法案,《政治学》揭示的“人人在法律之下”的宪法主义逐步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流思想。这无疑是亚里士多德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亚氏的《政治学》对柏拉图的学说提出不少批评,这种对业师不留情面的态度甚至使人怀疑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否融洽。亚里士多德曾这样悼念柏拉图:“他以有力的理论和言行身教,证明了好人的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他本人是独一无二的证明,或者说是第一个例证——这样的好人,坏人甚至连颂扬他也不配。”对恩师柏拉图,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曾作如下评论:“尽管这种讨论令人为难,因为它要谈及我们所爱者提倡的理论。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作这样的选择。确实,为了维护真理而牺牲个人的所爱者,看来这是我们,尤其是作为爱智者(又译哲学家)的责任,理由是虽然友爱与真理这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者的责任首先是追求真理。”亚氏这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性的求真精神,千百年来给人们以极大的启迪,甚至造就了西方文化中难能可贵的相对重视客观性的倾向。

郭仲德

2015年冬

## 译者序

亚里士多德用字精确,行文清晰,说理严谨,真不愧是世罕其俦的哲学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本书根据乔伊特(Jowett)英译(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订正本)译出,其中个别地方参照巴尔克(Barker)英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英译本中这两种最具权威,两学者用力之深令人折服,也颇令本译者汗颜。乔译简洁流畅,巴译娴熟细腻,均是不可多得之作,中文移译受益匪浅。

有些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枯燥乏味。亚氏的《政治学》铺陈理论,旁征博引,举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人读来兴味盎然。亚氏不同意柏拉图的原始共产主义,包括公共食堂在内。他指出人们只珍惜属于自己的物件,无人爱护公物,但私有财产制反而会使人慷慨大度,生扶贫之心。亚氏观察入微,令人不禁莞尔。

我所看过的《政治学》中文旧译本,把亚氏所言的“中等人”和“平民政体”分别译成“中产阶级”和“民主政体”。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有富人、穷人和不穷不富的人。将后一类人译为“中产阶级”必然引起读者误解,因为自马克思主义兴起后,“阶级”和“中产阶级”都有其特殊涵义。同样地,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以后,“民主政治”一词的内涵与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平民政治差别很大。因文害意的译法不免误导读者。

《政治学》旧译本把亚氏核心思想“适度”或“中度”译为(不带引号的)中庸。中国哲学界近10年来,比较(亚里士多德)适度与(孔子)中庸的论文发表了不下几十篇,两者不等同,这一点殆无疑义。翻译并非诠释,译者不可把个人见解掺杂在翻译中。严守分际,才能做到忠于原文。

亚氏逻辑学的权威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质与量是亚氏

《范畴论》中十大范畴的两项。他在《政治学》中界定公正原则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质与量截然不同,质是不能量化的。现在大家都用“质量”这个词,其实是把清晰的概念混淆了。如果说语言是约定俗成,“质量”指的就是“质”,这种毫无必要的俗定,可以说代表了思辨水平的下降。以讹传讹地使用含义不清的“质量”来翻译亚氏的论述,毕竟是说不过去的。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不精准的语言势必妨害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度、明晰度、精确性等。

目前国内读书风气日盛,在追求新知以外,许多读者渴望阅读和吸收世界精神文明中的精华。西北大学出版社应时代的要求,推出了世界经典名著译丛。社长兼总编辑马来先生和我在译事方面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他知道我当年在大学和国外研究所主修西方哲学,希望我能译出《政治学》一书。世界学术巨擘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奠基者,准确地移译亚氏著作不啻是一种文化使命,因此我就不自量力地承担下来。本人才疏学浅,错漏在所难免,尚祈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郭仲德

2015年于纽约

# 〔目 录〕

亚里士多德生平	/1
导 言	/1
译者序	/1
第一卷	/1
第二卷	/24
第三卷	/58
第四卷	/93
第五卷	/126
第六卷	/164
第七卷	/179
第八卷	/212

# 第一卷

## 第1章

<sup>1252a\*</sup> 据我们观察,每个城邦(或国家)都是某种共同体<sup>①</sup>,而每一个共同体的建立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善。所有共同体都以实现某种善为目的,国家作为包括其他所有共同体在内的最高(政治)共同体,所要实现的善大于任何其他共同体所企求的,即最高的善。

有些人认为政治家(处理政治共同体事务的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和拥有若干奴隶的主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sup>②</sup>,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人数的多寡而已。比方说,管理几个人的人称为主人,管理多些人的人称为家主,管理更多的人称为政治家或君王。而政治家与君王的区别在于:后者大权独揽;前者依照政治之术的规则行使权力,进行统治,也轮流接受统治。

以上的看法是错误的。使用我们一贯的考察方法,可予证明。政治学如同其他科学,必须对综合体<sup>③</sup>不断地做进一步分析,一直

\*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贝克尔所校订的亚里士多德文集希腊文页数,每页又分 a 栏及 b 栏(1831 年柏林版)。历来学者引用亚氏原著均以该版本页数为准。

① 或译“社会团体”。

② 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58E 至 259D(页数按照斯蒂芬斯 1578 年版本,下同)

③ 或译“组合物”。

到单纯的元素或者整体的最细微部分为止。同理,唯有研究分析城邦的组成部分,才能了解各类管理之间的差异以及能否对各类管理建立精确的科学知识。

## 第2章

从事物(不论是城邦还是其他任何研究对象)的始源及其自然发展来考察,可得出最清晰的了解。首先,互相依存的生物必须结合在一起。例如,男女必须结合才能生殖——这种事本身无可选择。<sup>①</sup>人类同其他动植物一样,出于本性,意欲留下酷肖他们的后代。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联合也是必需的,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保存。具有智慧、能深谋远虑的人是天生的统治者和主人,而具有体力、能依指示办事的人则是天生的奴隶,适合于被统治。因此,主人和奴隶有共同的利益。

<sup>1252b</sup>女人和奴隶在天赋方面却不一样,由于世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自然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工具。自然毫不省事,不像德尔斐铁匠铸造的利刃<sup>②</sup>那样。这是因为每种工具作专门、单一的用途时最好使用。可是,野蛮民族对女人和奴隶不加区分,因为他们之中没有天生的统治者,男女结合只是男性奴隶和地位与奴隶等同的女人结合。所以诗人说:

希腊人统治野蛮人,  
谁曰不宜?

它的含义是野蛮人和奴隶在本性上是相同的。

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基本关系首先形成家庭。诗人希西沃图说得贴切:

---

① 亚氏所说的选择是理性的,不同于本能的、自然的驱使。

② 这种利刃可兼作宰牲、剥皮和出骨之用。

先营家室，以安其妻。

爰畜牡牛，以曳其犁。

对穷人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奴隶。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嘉隆达斯称家庭成员为“食橱伴侣”，克里特人厄庇米尼特称之为“食槽伴侣”。

下一阶段就是村落的形成。村落是由一个以上的家庭为满足除生活基本需要以外的其他需要而建立的共同体。村落的形成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家中几辈和孙辈繁衍的结果。所以有人说村落的成员是“同乳所哺”，或者是“众子孙”。希腊人的城邦最初由君王统治（迄今野蛮人的情况仍然如此）就是这个缘故。希腊人在建立城邦以前，已习惯于君王式的统治：在家庭中，由最年长者统治；在村落中，由于血缘关系，由年纪最大的长老统治。正如荷马描述远古散居四方的部落时所说的：

每个人各自给妻儿订立法规。<sup>①</sup>

人们说众神有君王，这正是因为他们在君王统治之下或者在远古时曾被君王统治。他们不仅想象众神的形象同自己一样，甚至连生活方式也和他们相同。

最后的阶段就是由几个村落组成单一共同体——城邦。城邦发展起来是为了确保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在这一点上，它还不能算自足。已发展的城邦继续存在却是为了确保优良的生活，这才是完全自足。

城邦是由早期自然存在的共同体演变而来的，因此城邦也是自然存在的。城邦是这些共同体的目的——事物的本性即其目的。每一事物完全发展起来称为自然，<sup>②</sup>无论是一个人、一匹马或

① 荷马著《奥德赛》，IX 114 至 115。

② 这是亚氏哲学的基本理论，即目的论自然观。



者一个家庭都是如此。<sup>1253a</sup>除此以外,事物的目的或终极目的乃是完美。城邦旨在实现自足,自足就是城邦的目的,因此完美。自然旨在达成完美,城邦促成自足(完美),因而是合乎自然的。

由此可见,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由于本性,非因偶然原因而不归属任何城邦的人,他不是太好就是太坏,不是超人就是非人;他们有如荷马所斥责的好战的遭放逐之人:无族、无法、无家,这种人生性好斗,他们拒不合作,有如一局棋中的孤子。

人是政治动物,他又显然不同于蜜蜂或者其他群居动物。依据我们的学说,自然创造的一切都是具有某种目的的。所有动物中,唯有人具备言语的天赋。言语有别于声音;其他动物也能发声,表达出快乐和痛苦。这些动物具有的本性确实使他们感受到快乐和痛苦,而且还让他们彼此传递这方面的讯息。语言却能表达什么是有利或有害,进而表达什么是公正或不义。人与其他动物的真正差别在于:只有人才具备善恶是非的辨识能力,而具备这种辨识能力的生物的组合构成了家庭和城邦。

除此以外,从自然的次序<sup>①</sup>来说,城邦显然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全体必然先于部分。比方说,整个身体如被摧毁,就不会有手或足。也许有人提到断手(或断足),但这就与原来所指的手(或足)不一样了,因为手已不复是手(断手只具有石造的手那样的含义)。一切事物的特有性质来自其功能和能力,如果事物不能发挥固有的功能,就不能称为同一物;就算用同名,亦不是同物。

个人在孤立时,便不能完全自足,他就像部分而非全体(城邦是全体,个人只是部分)。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或者是觉得自足而不需要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他不是城

---

① 自然具有目的,人和家庭的目的必须通过城邦才能实现。